

「明」王士性撰 周振鶴點校

五岳遊草 廣志繹

新校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明〕王士性撰 周振鶴點校



五岳遊草 廣志繹

新校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五岳遊草 廣志繹 新校本

五岳遊草：廣志繹：新校本／（明）王士性撰；

周振鶴點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ISBN 978-7-208-15781-1

I. ①五… II. ①王… ②周… III. ①歷史地理—中

國—明代 IV. ①K928.648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9)第051247號

作者：（明）王士性 撰 周振鶴 點校

責任編輯：倪文君

封面設計：小陽工作室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一九三號)

發行：上海人民出版社發行中心

印刷：上海盛通時代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635×965 1/16

印張：25.5

插頁：6

字數：271,000

版次：二〇一九年五月第一版

印次：二〇一九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208-15781-1/K·2835

定價：一八圓

王士性（一五四七—一五九八），字恒叔，號元白道人，浙江臨海人。明代著名人文地理學家，性喜遊歷。萬歷五年（一五七一）成進士後相繼在河南、北京、四川、廣西、雲南、山東、南京等地做官，足跡遍及當時的兩京十二省，凡所到之處，對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悉心考證；對地方風物，廣事搜訪，詳加記載，寫下了許多精彩的遊記與紀遊詩。

周振鶴，一九四一年生於廈門，一九五八—一九六三年先后就讀於廈門大學和福州大學礦冶系，一九七八年考入復旦大學讀研究生，師從譚其驤院士，一九八三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為我國首批兩名文科博士之一。現為復旦大學特聘資深教授。擅長政治地理、文化地理、地方制度史、近代新聞史以及文化語言學、語言接觸史的研究。

五岳遊草 廣志繹

新校本

新版綴語

五岳遊草廣志繹校點本於二〇〇六年出版之後，書品上曾刊載兩篇批評文章，指出標點方面還有可改進之處，此次再版，不但吸取了其中一些意見，同時又請夏婧副教授從頭到尾通校一遍，又有改進之處數十，足見古籍校點工作之不易爲也。值此新版問世之時，謹對以上幫助表示深摯的謝意。同時希望讀者不吝賜教，期待有臻於至善的更新版。

周振鶴 謹識

前言

王士性，字恒叔，號元白道人，浙江臨海人。生於明代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卒於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性喜遊歷，爲諸生時已遊杭州及越中佳山水。萬曆五年（一五七七）登進士，此後相繼在河南、北京、四川、廣西、雲南、山東、南京等地做官，除福建以外，他的足跡遍及當時的兩京十二省，寫下了許多精彩的遊記與紀遊詩，結集爲五岳遊草。晚年又對所遊歷和考察的對象加以理論思維，相繼寫出了廣遊志和廣志繹兩部傑出的地理學著作。上述三書所體現出來的地理學思想和成就以及所保存下來的寶貴的地理資料，足使他躋身於我國歷史上的大地理學家之列而毫無愧色，遺憾的是他被冷落了將近四百年，尤其在清代中葉以後幾不爲人所知。本書的編輯目的就在於引起大家的注意，不但注意於王士性一個人，而且注意於明後期的地理學家群體，乃至於我國歷史上的所有的地理學家。

自萬曆以後，明代社會風氣發生很大變化，從空談性理轉入經世務實，崇尚實學的思潮逐漸形成。在這個「天崩地解」的大變動時代，許多知識分子主張「不必矯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寄情於山水之間，以遍遊五岳爲目標，明人別集中因而不乏模山範水的詩歌和遊記。其中的少數人進而認真觀察自然和社會，寫下許多有見地、有價值的地理筆記，在客觀上使地理學從歷史學的附庸下解放出來，逐步發展成爲一門獨立的學科。王士性和稍後的徐霞客是這些少數人中的佼佼者，他們不但眼光敏銳，而且思路比別人開闊；不但觀察到他人所未注意到的事物與現象，而且開始從地理學的角度對之進行類比和分析，於是成就了廣志繹和徐霞客遊記這樣輝煌的地理著作。徐、王二人後先輝映，標志着我國地理學發展史上的重大轉折。所不同的祇是士性的成就側重於人文地理方面，霞客的造詣主要表現在自然地理領域；霞客之遊以私出，士性之遊多假仕宦之便而已。

王士性宣稱：「吾視天地間一切造化之變，人情物理、悲喜順逆之遭，無不於吾遊寄焉。」（五岳遊草自序）此處所謂的「造化之變」指自然環境及其變遷，「人情物理、悲喜順逆之遭」則意味着社會、人文現象的變化。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他特別注意觀察各地的地理環境、民情風俗、宗教文化、物產交通，並比較其間的差異，從而在人文地理的各個分支，如風俗地理、文化地理、經濟地理、政

治地理、民族地理乃至軍事地理的研究都留下自己的真知灼見。同時他又注重分析人與環境的關係，繼承並發展了我國自古以來重視人地關係研究的傳統。明人的遊歷考察多注重自然山水，獨有王士性亦並重考察人文現象，這正是他高人一籌之處。中國古代人文地理雖然比較發達，但是自漢書地理志以後，保持長盛不衰的主要是對於疆域政區沿革變遷的記述，而於文化、經濟、風俗等領域則缺乏比較系統完善的研究。究其原因，乃是偏重文獻的考證和口耳相傳的見聞，缺乏實地考察的緣故。王士性批評這種「藉耳爲口，假筆於書」的作風，因此他的記述「皆身所見聞也，不則寧闕如焉」。也正因爲如此，他能夠對親見親聞的事物和現象進行深入的理論思維，進而探索地理學的內在規律。因而廣遊志、廣志繹與徐霞客遊記不同，它們不是日記式的旅遊實錄，而是在實地考察之後，對於所得材料去粗取精、整理排比並加上理論思維的地理著作。所以它在篇幅上雖比不上徐霞客遊記，但論內容的豐富與對地理學的貢獻却毫不遜色，甚且有所過之。王士性的旅遊行蹤則另入五岳遊草中，極簡練，而又文采煥然。

在王士性的地理著作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他深刻地認識到地理學的區域性特點。因此他首先以全國範圍作爲區域研究的對象，寫成了廣遊志（即康熙本廣志繹所附雜誌），分析各地在自然環境

(如地脉、形勝、風土) 以及人文因素(如少數民族、宗教、方言)的差異。在地脉部分，他詳細闡明了以北龍、中龍和南龍爲三大主幹的山脉分佈系列，這是唐代僧一行山河兩戒說以來的最新發展。在形勝一節中，他分析了明代兩京十三省的自然地理基礎，認爲其分劃大致是合理的，過去從未有人對於政區的地理背景作過這樣的分析。在全編的最後一段，王士性又歷數各地的方言差異：「聲音，八方各以其鄉土，不純於正聲，難以彼此相誚也。有一郡一邑異者，亦有分大江南北異者。……若一省一郡異者，如齊、魯發聲洪，淮、揚腰聲重，徽、歙尾聲長。」對方言地理表現出極大興趣。

晚年息遊之後，王士性不滿足於廣遊志過於簡單的論述，更作廣志繹五卷（第六卷有目無文不計），以全面深入地表達自己的地理學思想。第一卷方輿崖略是全國地理總叙，第二至第五卷是各地分論，依次爲兩都（北京、南京）、江北四省（河南、陝西、山東、山西）、江南諸省（浙江、江西、湖廣、廣東）和西南諸省（四川、廣西、雲南、貴州）。方輿崖略是廣遊志的延伸，從全國的範圍繼續分析地理現象的地域分異。例如在經濟地理方面記述各地聚散貨物之異說：「天下馬頭，物所出所聚集處。蘇、杭之幣，淮陰之糧，維揚之鹽，臨清、濟寧之貨，徐州之車贏，京師城隍，燈市之骨董，無錫之米，建陽之書，浮梁之瓷，寧、台之鰲，香山之番舶，廣陵之姬，溫州之漆器。」在文化地理方面則注意到南北

科舉人物多寡的不同：「江北山川夷曠，聲名文物所發泄者不甚偏勝；江南山川盤鬱，其融結偏厚處則科第爲多。如浙之餘姚、慈溪，閩之泉州，楚之黃州，蜀之內江、富順，粵之全州、馬平，每甲於他郡邑。」甚至在飲食習慣方面也指出南北的差異：「海南人食魚蝦，北人厭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惡其膻；河北人食胡葱、蒜、薤，江南畏其辛辣，而身不自覺。此皆水土積習，不能強同。」

除方輿崖略外，廣志繹的其他篇章深入地闡明各省内部的地域差異現象，構成色彩紛呈的地理「馬賽克」。例如，對於浙江風俗文化的差異，王士性就有精闢的見解：「兩浙東西以江爲界而風俗因之。浙西俗繁華，人性纖巧，雅文物，喜飾幣悅，多巨室大豪。……浙東俗敦樸，人性儉嗇椎魯，尚古

淳風，重節概，鮮富商大賈。」而浙東的風俗又可細分爲三區：「寧、紹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爲外營，又傭書舞文，競賈販錐刀之利，人大半食於外；金、衢武健負氣善訟，六郡材官所自出；台、溫、處山海之民，獵山漁海，耕農自食，賈不出門，以視浙西迥乎上國矣。」這裏所劃分的浙江風俗文化區，基本上與當時浙江省所屬十一府的區劃相一致，並且直到今天也仍然可以作爲劃分浙江文化區的參考。中國歷代行政區劃的變遷雖然以政治因素最爲主要，但也受着自然環境的制約，以及經濟、文化乃至軍事等因素的影響。因此行政區劃往往與自然區劃、經濟區劃或文化區劃存在某種契合。在浙

江，這一點表現得尤其典型。王士性雖以政區作爲區域研究的基礎，但却不以之代替其他類型的區劃。例如，他注意到語言在文化分區中的重要標志作用。他說：潮州「其俗之繁華既與漳州同，而其語言又與漳、泉二郡通，蓋惠作廣音而潮作閩音，故曰潮隸閩爲是」。也就是說，就行政區劃而言，潮州雖然隸屬廣東，但在文化分區方面却應該與福建的泉州與漳州同屬一區。四百年前而有如此見識，的確不同凡響。

在經世實用思潮的影響下，王士性還產生了後來稱之爲「郡國利病」的思想。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注意觀察與分析各地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長處（利）和短處（病），以確定環境對某種社會需要的適宜或者有利的程度。這實質上已初具現代地理學的評價研究的雛形。例如，他在評論杭州西湖作爲旅遊勝地時就獨具慧眼地指出：「遊觀雖非樸俗，然西湖業已爲遊地，則細民所藉爲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時禁之，固以易俗，但漁者、舟者、戲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業，反不便於此輩也。」這活脫是現代人的經濟眼光了。作爲封建士大夫，他不便鼓吹旅遊業，但却曲折地表達了杭州的旅遊地利。清人已注意到王士性的這一思想，所以康熙十五年楊體元在刻廣志繹序中說，王士性「其志險易要害、漕河海運、天官地理、五方風俗、九徼情形，以及草木鳥獸、藥餌方物、飲食制度、早晚燥

濕、高卑遠近，各因時地異宜，悉如指掌。使經綸天下者得其大利大害，見諸石畫，可以佐太平」。如果我們誇大點說，在王士性那裏地理學似乎已是一門應用科學了。

值得注意的是王士性還具有動態性的觀念，認為地理現象是在不斷變化發展的。譬如說，他明確指出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出現轉移的現象。他說：「江南佳麗不及千年。孫吳立國建康，六代繁華，雖古今無比，然亦建康一隅而止，吳、越風氣未盡開也。……至殘唐錢氏立國，吳越五王繼世，兩浙始繁。王審知、李璟分據，八閩始盛。然後宋分天下爲二十三路，江南始居其八焉，……趙宋至今僅六七百年，正當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轉而黔、粵也。」生在明代，他不但注意到經濟重心已從北方轉移到江南，而且還推測有繼續轉移到嶺南和西南的可能。這是何等高明的見識。地理現象的變化不僅表現在地域上的轉移，還表現在新現象的產生。例如，明代揚州就由於鹽商的麇集而出現「養瘦馬」的畸俗：「廣陵蓄姬妾家，俗稱「養瘦馬」，多謂取他人子女而鞠育之，然不啻己生也。天下不少美婦人，而必於廣陵者，其保姆教訓，嚴閨門，習禮法，上者善琴棋歌咏，最上者書畫，次者亦刺繡女工。至於趨侍嫡長，退讓儕輩，極其進退淺深，不失常度，不致慙慙起爭，費男子心神。故納侍者類於廣陵覓之。」這一畸俗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初。

在人地關係方面，王士性認為自然環境對於人的行為方式有着決定性的影響。他以浙江為例說：「杭、嘉、湖平原水鄉，是為澤國之民；金、衢、嚴、處丘陵險阻，是為山谷之民，寧、紹、台、溫連山大海，是為海濱之民。三民各自為俗：澤國之民，舟楫為居，百貨所聚，閭閻易於富貴，俗尚奢侈，縉紳氣勢大而衆庶小；山谷之民，石氣所鍾，猛烈驚惶，輕犯刑法，喜習儉素，然豪民頗負氣，聚黨與而傲縉紳；海濱之民，餐風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為生不甚窮，以不通商販不甚富，閭閻與縉紳相安，官民得貴賤之中，俗尚居奢儉之半。」這是中國古代「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思想的發展。

西方最明顯表現出與這種地理環境決定論思想相類似的是黑格爾。他在歷史哲學中，將世界分為高地、平原和濱海三類地區，以蒙古、阿拉伯、中國、印度、埃及和歐洲作為這三種類型地區的代表。進而認為高地「居民之特色，為家長制的生活」，「絕無法律關係的存在」；平原農耕人民閉關自守，農業「按着四季而進行，土地之所有權與各項法律關係又隨之而生」；沿海的人民則被大海「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海盜式的掠奪，但同時也鼓勵人類從事商業與正當的利潤」。不過黑格爾生活的年代（一七七〇——一八三一）比王士性已晚了二百

多年。

既然地理環境對於人類社會有如此重大的制約作用，那麼當環境發生變遷時，文化的重心就會出現相應的轉移，這就是所謂「天運循環，地脉移動，彼此乘除之理」。所以王士性在廣遊志中說：「自昔以雍、冀、河、洛爲中國，楚、吳、越爲夷，今聲名文物反以東南爲盛，大河南北不無少讓何？客有云：此天運循環，地脉移動，彼此乘除之理。余謂是則然矣。」又說：「宜今日東南之獨盛也。然東南他日盛而久，其勢未有不轉而雲、貴、百粵。如樹花先開，必於木末，其髓盛而花不盡者，又轉而老幹內，時溢而成萼、薇、桂等花皆然。山川氣寧與花木異？」

明代雖然旅遊成風，但並非人人都是地理學家。儘管觀察的是同樣的大千世界，但所得印象和收獲並不一樣。王士性當時已覺察到這一點，所以他在廣志繹自序中說：「夫六合無涯，萬期何息，作者以澤，量非一家。然而言人人殊，故談玄虛者，以三車九轉，而六藝之用衰；綜名實者，尚衡石鑄刑書，而結繩之則遠；攬風雅者，多花間草堂，而道德之旨溺；傳幽怪者，喜蛇神牛鬼，而布菽之軌殊。」王士性自認與這四種人不一樣，他所重的是地理現象。所以他接着說：「余志否否，足板所到，奚囊所餘，星野山川之較，昆蟲草木之微，皇戚國策、里語方言之蹟，意得則書，懶則止。榻前杖底，每

每追維故實，索筆而隨之。非無類，非無非類，無深言，無非深言。」所謂「意得則書」的意，就是在理論思維後的發現與發明。寫下來的自然就是「深言」大義了。

王士性深入細緻的觀察與縝密獨到的思想，給明末清初的學者以巨大的影響。清初，楊體元將廣志繹「遍質之博雅君子，如曹秋岳夫子、沈大匡先生、沈次柔、顧寧人、項東井諸同學，咸謂是書該而核，簡而暢，奇而有本，逸而不誣」。就中以顧寧人（即顧炎武）所受影響最巨。顧氏是清初樸學大家，研究者衆矣，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顧的地理學思想實淵自王士性。

顧炎武的三大著作，無例外的都打上王士性影響的印記。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是顧氏在「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國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之後，才編著成的第一等作品。後者爲「輿地之記」，前者爲「利病之書」。所謂「利病」，就是王士性對於各地地理背景優劣分析的發展，是經世實用思想在地理方面的實踐。也就是說，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有關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爲泥古之空言」（全祖望語）。不但如此，在該書第一卷輿地山川總論中，顧氏更是全文照錄了王士性五岳遊草裏地脉、形勝、風土三節文字，足見顧炎武對王氏地理觀的佩服。且由於王士性著作流傳不廣，後人讀利病書，甚至把王氏的思想當成顧炎武的思想

來引用，尤其是其中關於「天運循環，地脉移動」的思想。

肇域志是未完成的稿本，直到最近才整理出版。該書按兩京十三省分述各地的地理現象，具全國地理總志的性質。顧氏在各省的最後，都抄錄了廣志繹相關省份的幾乎全部內容，而冠以方輿崖略的總稱。顧炎武這樣做，顯然是因為廣志繹兼有保存地理資料與啓發思維的重要價值。此外，奠定顧氏樸學大家地位的筆記式名著日知錄，也同樣看得見王士性的影響，例如在「州縣賦稅」一節中就引用了廣志繹卷一關於各地賦稅負擔懸殊不均的分析，而後提出自己的見解：「然則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統轄，度幅員以界郡縣，則上田以起，徵科乃平，天下之先務，不可以慮始之艱，而廢萬年之利矣。」

顧炎武的思想對於清代學術發展起着巨大的影響，因此王士性的地理學觀點也就間接地影響了後人。然而，由於清代文網綦嚴，乾、嘉時期的學者走入了考據的胡同，除了沿革地理一枝獨秀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其他分支都走了下坡，以至大清一統志裏的各地風俗一項，竟然照抄兩千年前的漢書地理志，全然無視地理現象發展變化的事實。也因爲如此，王士性自清代中葉以後就逐漸被人遺忘，直至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先師譚其驤先生將王士性與徐霞客相提並論之後，才使王士性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康熙本廣志繹也埋沒很久，直到不久前才被重新發現。